

绪 论

1997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总书记江泽民同志主持下,以《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为题,向全党作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报告。这是中国迈向21世纪,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性的文件。这个文件明确地提出了“邓小平理论”,它把邓小平同志多年来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都概括在“邓小平理论”这个范畴中,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续。

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哲学思想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两句话的提出并不是为人们一般地学习理论,而是邓小平根据当时领导上的错误提出来的。从1958年中国大跃进开始到“文化大革命”,党中央和毛泽东由于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产生过一些错误的决定和行动,需要加以纠正。1976年毛泽东逝世以后,当时有人曾提出两个“凡是”的理论,认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就像两个紧箍咒扣在人们的头上,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将使我们的思想僵化,使我们的工作无法发展。因此在1977年邓小平恢复工作以后,这两个“凡是”遭到邓小平的反对。邓小平在《两个凡是符合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就曾引用毛泽东的话说,“我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

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因此必须坚决反对两个“凡是”,从过去的不切合实际的思想中解放出来,根据客观发展的实际,决定新的政策。以后又展开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样才在全国打开了解放思想的局面。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也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如果中国革命不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某些同志只图从城市暴动中夺取政权的思想中解放出来,另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途径,中国革命也是难于取得胜利的。所谓解放思想并不是无根据的乱想,它必须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研究客观规律,从规律中寻求正确的思想,这才叫真正的解放思想。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两句的基本精神是统一的,是不能分开理解的。没有实事求是的思想解放,必然陷于胡思乱想。

“实事求是”,这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句有名的成语,它代表了中国人民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这个命题最早见于班固的《汉书·河间献王传》,在 20 世纪初的湖南岳麓书院曾以“实事求是”作为横匾挂在讲堂正门。毛泽东在这里求学时,就受到这种学风的影响,后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传入中国,于是毛泽东就以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给予新的解释,又把这四个字嵌在中央党校的大门口,使它成为中国革命的指针,成为中国人民最容易理解的马列主义思想。实事求是,一直是中国革命的大问题,我们中国革命过去受教条主义影响很深,犯了不少错误,因此在 1942 年整风前,毛泽东就非常强调要改造我们的学风,提出一切要从实际出发,从中找出工作的规律。在 1941 年,作为整风的准备,他先写了一篇《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文章,他说:“我们的工作必须是有的放矢。‘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

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毛泽东同志这个解释，大大超出了一般人的理解，他不仅要尊重事实，而且要从客观事物的研究中找出它的内部联系，即规律，作为人们行动的指针，这就大大丰富了实事求是这一光辉思想的含义。后来在整顿‘三风’时，毛泽东就提出了学风问题，也就是要求我们的同志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做死教条，而是要当成行动的指南，是用它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实际，要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总而言之，必须使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才能真正实事求是。

从1942年整风以后，我们整掉了各种歪风，纠正了过去‘左’倾和右倾错误，使革命走人正轨，最终导致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蒋家王朝，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由于实事求是思想的正确理解和运用，我国顺利地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向了社会主义革命。在接收国民党的官僚资本时，由于发动了工人阶级的护厂等活动，并采取了适当措施，使我们接收的财产没有受到损失。我们的土地改革，由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根据地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所以也能顺利地实现。以后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时党所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正确的。所谓“一化三改”，以工业化为中心，取得很大成绩。三改有两翼，一翼是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由于我们党在根据地进行了农业的互助合作运动，已有一定的经验，采取了由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三步走的办法，都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在手工业改造方面，也有很大成绩，只是有的规模过大，或者不适当的组织，忽视了某些手工业的特性，后来也纠正了。

至于另一翼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更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当时在党的领导下，先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然后转入公私合营，最后实行赎买，也是顺利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把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转变成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济。总之，由于实事求是的正确运用，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和适当的措施，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获得了巨大成功。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的国民经济得到了高速发展。

成功和失败往往是互为前提，互相转化的。失败是成功之母，同样，如果忽视了实事求是的精神，那也可能由成功转向失败。第一个五年计划使我国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改造获得巨大成功，到 1957 年我国已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国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产生必然引起生产力的发展。1958 年全国掀起了大跃进高潮。由于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事业等由私营转为国营，工人已成为国家的主人，工人可以管理企业，不再受资本家剥削，这就大大提高了工人的积极性。另外，在农村由于农民组织起来，可以解决农民一家一户力量薄弱无法战胜自然灾害的问题，于是都愿意联合起来进行生产。当时首要的任务就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全国农村到处筑坝拦洪、打井修渠，真是战天斗地，热气腾腾，的确是一个十分激动人心的景象。

但是，在大跃进中，由于某些领导人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违反实事求是的原则，使大跃进夭折。当时最大的问题是浮夸风、高指标、共产风。浮夸风是最明显的不实事求是，许多干部公然扯谎，形成全国性的大扯谎，以蒙蔽上级，蒙蔽党中央，致使党中央根据不实的报告而制定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政策。如高指标，1958 年的粮食产量，据以后的评估只有 4000 亿斤，而当时报上的数字很高，经过中央核实后发表的数字为 7500 亿斤，由此又规定 1957 年的粮食产量计划为 10000 亿斤，这完全是不可能达到的指标。又如钢的产量，1958 年是 535 万吨，本来已比解放时的 15 万

吨增加很多。根据当时的条件,1958年可以再提高30%—40%,这样逐步前进是可以取得好成绩的,但是当时要求过急,一下子就提出一年翻一番,并在全国发动大炼钢铁运动,不管有无铁矿煤炭和生产技术都要大炼,形成一种无法抵抗的强迫命令,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与浮夸风、高指标相伴而来的是共产风,当时由于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按照河流沟渠管理,所涉及的流域范围广,已超出了合作社的规模,加上共产风,于是就提出了按一乡一社,也就是以一万人或一万户组织人民公社。这种公社实际上是把贫富生产队都一律拉平,造成群众中的巨大矛盾。当时误认为粮食生产很多,人们就可以敞开肚皮吃饭了,于是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吃饭不要钱。本来并不多的粮食又出现了大量的浪费,结果造成1959—1961年全国性的大饥荒。当时的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也就是国家的政权组织与经济组织的合一。国家干部对经济的领导不按经济规律办事,而主要依靠行政的强迫命令。当时出现的许多“大兵团作战”方式,动辄就是由领导带领数千人数百人在地里一齐劳动,造成窝工浪费。

人民公社实际上是共产风的产物,当时的共产风之所以产生,不单纯是由于粮食产量的浮夸而引起的,粮食的浮夸只是一种导因。由于中国人民长期处于封建官僚的剥削统治下,十分贫困,难得温饱,无论从领导者或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来说,都希望能尽早解决吃饭问题,做到全国人民都能“有田同种,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像太平天国所主张的那样“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是一种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想。当时无论是领导者还是群众都认为现在可以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了,不仅仅是吃饭,几乎可以包揽一个人的全部生活。当时许多人民公社都提出所谓“五包”“十包”,包吃,包穿,包住,包生,包葬,这就是说把一个人的生活全包完了。1997年11月《中华儿女》刊物上曾发表《毛泽东在

庐山下的是非风云》一文,说 1958 年 3 月毛泽东又重读康有为的《大同书》。康有为在这本书里描述了一种空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盛赞《大同书》是我们共产党人追求的目标。大同思想是我们中国最古老的思想,它一直是中国最令人崇拜的传统思想,它是儒家思想中最辉煌的一章。

大同思想在许多观点上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是一致的,因此,也为中国共产党人所接受。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同志特别欣赏康有为《大同书》的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说:“康有为虽然没有读过马克思的书,但他把理想的社会具体化了。”这是不是说中国的大同思想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有一种偶然的巧合呢?我能不能说是纯粹的巧合,这中间有一定的联系。我们中国的大同思想源于儒家经典著作《礼记》中的‘礼运’篇。这一篇叙述了孔子的思想。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一篇所描写的确是古代原始共产主义的景象,并不全是孔子的空想。正因为如此,所以《大同书》所描绘的原始共产主义与马克思所主张的将来的共产主义理想必然会有共同之处。如都要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原始共产主义保障了全体人民生活,我们今后的共产主义在消灭剥削之后,也要保障全体人民生活,而且是共同富裕,按需分配。毛泽东很欣赏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但是康有为是处于封建专制的帝王统治之下,并不敢公开提出他的观点,只是在背后偷偷地写了这一本书。而 1958 年的中国则不同,这时中国已是由共产党领导,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当时那种大跃进的伟大热潮中,由虚假的浮夸引发起来的共产风,使毛泽东也急于寻找到实现共产主义的方法。因而出现了人民公社,不仅要实行

一乡一社的公社所有制，还要在公社内大办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当时许多公社的共产风五花八门，他们提出的“五包”“十包”，实际上就是要实行按需分配。在当时那种生产力水平非常低的情况下，怎么可能把全体人民生活都包起来呢？且不说当时所报的粮食数字是过分夸大的，即使是实在的，全国每人平均 1000 斤粮食，难道仅这点东西就能实行共产主义吗？因此当时许多人的共产主义只能是空想的共产主义，实际上的平均主义。由于当时许多公社都吃了过头粮，加上当时大炼钢铁对粮食的糟践，以致造成以后三年的粮食危机。以后经过调整，人民公社已由大的公社所有制改为以小型的以生产小队为基础的所有制，分配制度实行按劳分配，采用工分制，取消公共食堂，所有的‘包’都自行取消。这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制定了《人民公社六十条》，才使人民公社走上正轨。

1958 年的人民公社运动实质上也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一次大试验，这次试验有很重要的意义。它的意义就在于证明社会主义是不能只是依靠正义、公理等空想来实现的。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他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考察了资本主义发展史而得出的结论。康有为的《大同书》也和欧洲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只是一些空想。1958 年的中国，虽然已经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而且由于生产关系的改造，已实现了公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生产力十分低下，也不可能实行共产主义。何况我们当时许多人所理解的共产主义与马克思所提的共产主义是相违背的。马克思所主张的共产主义，按照《共产党宣言》的提法：“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65 页）当然，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要消灭一切剥削的，它除了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以外，也要消灭封建主的和奴隶主的私有制。至于其他非剥削关系的所有制，他并未要求共产党人去消灭。关于这一个问题，马克思在

《资本论》第1卷《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的末尾有两句话非常重要。他说：“这种否定并不是重建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2页）后来，根据恩格斯的解释，共产主义社会一切生产资料是归公有。而在公有制基础上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经过分配而为劳动者个人所有。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个人所有制。既然生活资料属于个人所有，那么个人对这些生活资料的消费就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它并不要求由社会包起来，由社会来处置。因此，当时人民公社的“包”的作法并不是合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原则的。而且“包”的弊端也不少。因为包的主动权在公社干部手里，有些干部控制着生活资料，不仅多吃多占贪污盗窃，而且威胁社员，有不服从的，就不给分配。当时吃食堂，有的村干部对不服从领导的社员实行“扣饭”，即不准社员吃饭，以惩罚群众。在1960年我曾参加河北某县一个区的整社工作，当时许许多多村干部都打人，群众家里的粮食被搜刮一空，造成严重的饥荒。这种空想社会主义加政社合一，干部利用职权，既掌握生产资料，又控制生活资料，社员一点主动权都没有，甚至没有自由。我深深感到，社会主义如果没有民主，它的高度集权制度也可能成为转向奴隶制的根源。因此我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提出重建个人所有制十分重要。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这说明将来的共产主义是有充分自由的。这些充分自由必须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制。如果没有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制，那就不可能有什么个人自由。1958年中国空想社会主义的试验，可以使人们认识到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有区别的，是

不可能实现的。空想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是世界性的社会思潮，是许多善良人的理想，他们反对社会不公平，反对人欺负人、人压迫人、人剥削人，渴望建立一种公平的正义的社会，这种愿望是好的，没有好的愿望就没有好的行动。但是仅有好的愿望，那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把这种愿望纳入科学的领域，实事求是地研究社会发展规律，按照各自不同的社会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一步一步地脚踏实地前进，把社会主义真正建立在科学的轨道上，才能使之真正地实现。

中国经历了空想社会主义的试验，使中国人民深受教育。毛泽东同志虽然开始很重视大同思想，提倡共产主义风格，但当空想社会主义许多问题暴露出来之后，他都是认真纠正的。他首先提出了要划清两条线，一条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界线，他肯定了目前的人民公社仍然是集体所有制而不是全民所有制。另一条是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界线，目前的人民公社只能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他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一个穷国。”现在有些县委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还是很穷的呢？他们都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是产品极大丰富，否则怎么能实行按需分配呢？”毛主席批评当时人民公社搞供给制是搞平均主义，并不是按需分配（见吴冷西著《忆毛主席》，第 111 页）。毛主席是主张社会主义社会实行商品交换的，他批评陈伯达主张取消商品交换，实行产品调拨。他说：“保持头脑清醒。否则，急于过渡，搞产品调拨，农民会起来造反的。”（同上书 104 页）

后来毛主席调整了人民公社所有制结构，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也就是以原来的小队，一般只有二三十户，作为生产单位独立核算，这不仅便于领导，也消除了公社和大队平调生产队的

财产的权利。而且对过去已平调的财产，一律要算账退赔。指出那些平调的财产不是善财，而是劫财，不退赔不能平民愤。

在人民公社运动时期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干部的特殊风。当时公社干部既掌握政治大权，又掌握经济大权，一切生产与分配都操纵在他们手里。而且公社初期各种制度都还未建立起来，尤其是民主制度，公社的三级制各级都应有不同的民主制度。当时的许多干部都不是普选的，而是上面任命的。广大社员都只听干部指挥，社员对干部不仅没有监督权，连发言权都没有，甚至挨骂挨打，这样有些干部就可以为所欲为，干部的特殊风就必然出现。比如，在食堂吃饭，干部与群众的待遇就不一样，干部多吃多占，群众则吃不饱。以后又在各地开展了“四清”运动，原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后来中央决定，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以改变农村干部的组织性不强和思想作风等问题。事实上农村中已出现了新的阶级分化，许多地方问题相当严重，于是毛主席经过调查，提出在农村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提出“后 23 条”，强调了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本来毛主席最初提出这个问题是要清除农村少数坏干部，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四人帮”所利用，清除走资派成为打倒一切干部的借口。的确，这个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也在向“左”倾错误方向发展。毛主席的“左”倾错误思想是反右倾运动中，在庐山会议上错误地批判彭德怀同志开始的。当时毛主席、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都认为我们有些基层组织领导与我们党不能保持一致，需要整顿，但是对于矛盾性质的认识却不相同，如刘少奇同志对于农村问题的看法是四清四不清的矛盾，而毛主席却认为是阶级矛盾。这时毛主席感到阶级矛盾仍是主要的，因而又强调社会主义这个过渡时期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于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下，在 1966 年发动了一场“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主要是反修防修。如果在全党通过整党进行一次普遍性的教育，

只是把极少数坏人清除出党，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是错误的。它踢开党委闹革命，实行没有党领导的全国大民主，不能不形成全国性的无政府主义，一些坏分子唆使群众起来打倒一切干部，为了争权夺利，在群众中分成派系，组织武斗，形成全面内战，以致影响正常的生产，给国民经济造成不小的损失。

不过由于全党全国人民的努力，减轻了‘文化大革命’对生产的破坏，使生产继续前进，因此到 1978 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我国工农业仍然取得很大成绩。社会总产值从 1957 年的 1.606 亿元发展到 1978 年的 6.846 亿元，即 4.26 倍，粮食由 1957 年的 19505 万吨发展到 1978 年的 30477 万吨，即增加了 1 亿多吨，钢由 1957 年的 535 万吨发展到 1978 年的 3178 万吨，为 1957 年的 5.94 倍。这说明我们的国民经济仍在前进，并且取得巨大成绩。但是这也确实说明我国自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要求过高，脱离实际，以至延误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这里所谓脱离实际，就是脱离了我们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实际。中国在 1957 年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这仅仅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而生产力还十分落后，农村的自然经济尚无多大改变，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过高的要求是不切实际的。直到 1978 年 12 月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方针，才重新将中国的经济建设纳入正轨。

邓小平在毛泽东时代就参加了全国的领导工作。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他都经历过，历史的经验大大提高了他的认识和理论水平。失败是成功之母，毛泽东的成功和失误都对他有深刻的影响，他既要继承毛泽东的成功经验，也要克服他的失误，这是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由于毛泽东思想被林彪割裂和破坏了，现在必须恢复其原来的面貌，也就是要贯通毛泽东思想体系，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观点来研究实际，解决当前

的问题。而纠正过去的失误更不容易，必须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当时一些人认为凡是毛泽东所作的决策、凡是他作出的指示都不能反对，这就大大束缚了以后工作的发展。第一，毛泽东所讲的话和所作的决定并不都是绝对正确的。第二，由于时代在发展，过去的讲话和决定不可能都是一成不变的。所谓“两个凡是”是不符合马列主义的。后来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的讨论，恢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才使工作得到正常的发展。

邓小平掌握领导权以后，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

第一，废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在‘实事求是’方针指引下纠正一切混乱现象，平反冤假错案，恢复一切正常工作；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继续进行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这是邓小平理论基本出发点。1956年全国第八次党代表大会就决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目的是为了社会主义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发展社会生产力本来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最高目的，邓小平这个决策是根本性的决策。特别在中国，由于生产力十分落后，不发展生产力就无法在世界立足。邓小平指出：“我们中国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国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在中国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2—163页）这说明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意义。我们过去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耽误了10年，现在不能再耽误了。

第二，为了实现现代化，邓小平提出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即以1980年的生产总值为基数，从1981年到1990年，使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从1991年到2000年，再翻一番，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然后到21世纪，再经过30年到50

年,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邓小平之所以提出分三步走的战略,是因为我国人民生产和生活水平很低,只能有步骤地前进。据 1980 年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所说,我国人民现在平均只有 200 多美元。如果到 2000 年达到人均 800 美元,这个数字从发达国家来说是很小的,但由于我们的分配比资本主义社会合理,就可以使人民实现小康生活。而从全国国民生产总值来说,就可以达到 1 万亿美元,居于世界前列,使我们的国力成为较强的国家。到 21 世纪再经过 30 年到 50 年的建设,我国实现了四个现代化,人民生活虽然只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国力已可与发达国家看齐了。据统计,我国从 1981 年算起,到 1995 年仅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就已经实现了翻两番的任务。据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的报告讲:“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2000 年翻一番,使人民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到 21 世纪中叶建国 100 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三,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了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必须分三步走,是由于第一步的起点很低。我国过去的生产水平很低,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虽然我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但还是比较贫困的发展中国家。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共产主义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就是不发达的共产主义,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将来生产发展了可以实行按需分配时才能进入共产主义。我们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国家在历史上是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中间并未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生产力很低。因此,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只能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尚未达到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社会时期,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政策不能按高水平的要求去制定。如果说我们过去的政策有很多失误,那就是失误在提出过高的要求而不可能实现。重温大跃进的

历史经验,重新审查我们的政策,就能发觉我们过去认识的偏差,主要是没有认识到我们的社会性质尚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当然,也并不是完全没有认识,比如‘八大’的决议就是要解决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的矛盾,这说明是有认识的。但是并不很明确,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明确地提出了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把它作为决定政策的出发点,这才使我们的工作真正落到实处,能够脚踏实地地前进,这次‘十五大’江泽民同志对初级阶段的特征指出了八个方面的表现。其中最主要的是生产力的落后,农业主要还是手工劳动,农村相当广泛的还是属于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工业中许多企业仍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技术水平不高。农村人口仍占 80%,文化水平低。这都说明我们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当然,我国近 50 年的建设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我国的钢产量已经突破 1 亿吨,粮食平均每人 800 斤。我国已形成相当强大的国力。但是,从整个国家来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处在初级阶段,而且还会有相当长的时间仍处于这个阶段,这就决定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能要求过高,必须在初级阶段的基础上逐步发展生产力。

第四,改革开放。根据邓小平的提法:“概括一点说,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也是对内开放。通过开放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农村一开放,8 亿农民的积极性就起来了。城市经济的开放,同样要调动企业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根据邓小平的提法,对于‘开放’两个字的含义,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并不是同一个意思。对内搞活的开放,就是要解脱过去经济体制的束缚,如所说农村经济放开,就是解除人民公社体制的束缚,建立了以农民家庭为单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有独立自主的经营权,因而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中国的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由此也就引起了城市的改革开放。根据多年来的经验,束缚城市工业及其他各种企业广大职工的积极性的,是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

我国过去的计划经济是学习苏联的，它的基本特点是中央国家机关权力的高度集中，一切计划都由中央决定，下面各级只能按计划执行。各个生产企业以及商业交通运输事业等只有服从计划，完成规定的指标，这样就剥夺了广大职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因此邓小平提出要改革，给企业以独立自主的经营权，按照市场的需要，自行决定生产什么销售什么，并且决定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这样也就能使各个企业的负责人及广大职工不能不面对市场进行适销对路的生产，改进工艺，提高质量，以获取最好的经济效益。当然，不管农村改革或城市改革，并不只限于生产问题，还有流通问题，主要目的还要组织工农业的商品交换，以促进我国生产的发展，才有利于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因此，上面所说的国内搞活开放，包括的内容相当广泛，既有生产领域，又有流通领域，既有经济体制问题，又有工作方法问题。总之，归根到底，是要充分调动广大工人农民的积极性。

第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谓市场经济也就是商品经济。发展商品生产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不可逾越的阶段。原因如上所述，我国是在生产力极其落后，社会尚处在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优势的状况下，广大农村以自给经济为主，农产品的商品率很低，是不利于工业化和四个现代化的。过去的苏联曾采用计划经济替代商品经济，国家直接以计划发展工农业生产，并组织商品交换，曾起过很重要的作用。我国前 30 年的建设在学习苏联过程中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同时也发现不少问题。主要是计划经济的高度集中，对下面生产单位统得过死，而且有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缺陷，不能充分调动基层干部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因此必须进行改革。在 1979 年，邓小平就认为，只有资本主义才有市场经济的说法是不对的。他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由于过去计划经济处于统治地位，要突破计划经济这个框框并不容易。因此，中央和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是逐步深入的。直到 1992

年 1 月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这篇文章中，对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相提并论的。邓小平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73 页）显然，邓小平在这里是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持相同的看法，两者都是经济手段，两者都可以用，至于谁多一点谁少一点，那就要看情况而定。以后到 1992 年 10 月党的“十四大”时，党的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同志对这个问题有所突破。江泽民同志提出“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虽然明确指出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但已经不提计划经济。虽然国家的宏观调控中包含有计划，但是计划的分量就远不如市场经济。江泽民同志在报告中说：“实践表明，市场作用发挥比较充分的地方，经济活力就比较强，发展态势也比较好，我国经济要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加快发展，参与国际竞争，就必须继续强化市场机制。”显然江泽民同志是把市场经济作为发展中国经济的主要手段的。的确，我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开放了市场，国内经济大为活跃，商品经济大为发展，因而也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丰富了广大城乡人民生活。

第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两个基本点：一个是改革开放，一个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互相促进互相贯通的。改革开放是十分重要的，不改革开放没有出路，但改革开放必须有正确的方向，而且要有国家政权的保证，这四个坚持就是保证和约束改革开放不走邪路的重要武器。这里首要的问题是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我们提出改革的目的是要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是要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继续前进的改革，而不是向资本主义方向改革。至于开放，我们是要引进外国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而不是引进资本主

义的剥削制度和腐朽的东西。从社会历史的发展来说，资本主义社会是优越于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大生产中某些生产方式我们是可以学的。关于这一点，邓小平指出：“资本主义已有了几百年的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直接相联系的，还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将来实行共产主义，这是共产党人提出来的，也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离开了共产党这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其他任何阶级及其政党，无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都不能领导社会主义革命，也不能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担当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只能是共产党。因此，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也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同样的道理，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直接相联系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共产党人的灵魂。科学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亲手创立的，列宁和毛泽东都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且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取得苏联和中国革命的成功，他们都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而且内容丰富，它是共产党人的灵魂，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南，尤其是它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我们观察一切事物和处理一切工作的重要武器，是须臾不可离的。因此，我们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在“四个坚持”中，还有一个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叫人民民主专政。这里最重要的是政权。政权不仅表现为国家的权力，而且还有一套国家机构和武装力量，成为组织人民生产、安定社会生活、保卫国家安全的有力的武器。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它不是像历